



马的史诗，文明的经纬



找到共同利益与文化共鸣，是马匹贸易留给当代的重要智慧。

视觉中国供图

本报记者 王一



马越千年，何以为钥

读书周刊：今年是中国农历马年，“马”所承载的奋进、强健、敏捷等吉祥寓意早已深深融入东方文明的精神内核，成为跨越地域与时代的文化符号。而在美国学者戴维·查费茨的眼中，马匹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串联欧亚大陆数千年文明的无形纽带，是塑造权力秩序、经济格局与文化形态的关键力量。其著作《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以独特的“马匹视角”重构历史叙事，打破了传统文明研究的边界。

在专访中，戴维·查费茨从马年文化切入，探寻马匹与文明互动的深层逻辑，以及这段厚重历史留给当代的珍贵启示。

戴维·查费茨：我认为完全契合。十二生肖是中华文化中极为古老的组成部分。每种动物都既代表一种美德，也象征一种缺憾；既蕴含机遇，也潜藏危险。马年的传统特质，清晰地映照了马匹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马具有攻击性且性情急躁，因此可能引发纷争，这对应“劫掠者”；马强壮而威严，对应“统治者”；马速度迅捷，促进了旅行、探索与贸易——这便是我所说的“交易者”。

我还发现，十二生肖历法在欧亚大陆也被广泛使用。我在阿富汗旅行时，当地人会通过自己的生肖来告知年龄。我刚了解到，塔吉克斯坦当下也在庆祝马年。可见，马匹不仅在欧亚大陆具有重要地位，其象征意义也被广泛共享。

戴维·查费茨：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曾称，他在罗马废墟中萌生了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念头，但我没有这样确切的、戏剧性的瞬间，我的研究视角是在多年碎片化经历与学术思考中逐步成形的。

戴维·查费茨：这样的发现有很多，尽管有些惊喜其实一直摆在眼前。例如，战车作战居然早于骑兵出现。在中国商朝、荷马时代的希腊以及吠陀时代的印度，武士们都乘坐战车作战。我曾以为，既然战车在技术上比单纯骑乘马匹更为复杂，那么马匹被驯化后，骑兵就应随之出现。但事实上，战车作战比骑兵作战早出现

千余年。原来，古代的马匹形体不够大、力量也不足，无法承载身着盔甲的骑兵。而且，马具的发展也未达到支持骑兵作战的水平：要在混战中挥舞剑、长矛，需要特制的马缰、马衔和马鞍。事实上，最早的骑乘作战形式是射箭，但源于乘坐战车参战的弓箭手。

还有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草原居民掌握着精湛的技艺，尤其是冶金术。辐辏轮正是他们的发明。谁能想到，如此精巧的交通工具，竟诞生于我们眼中荒凉且欠发达的土地？其实，草原民族竭力完善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流动性对他们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发明了战车。最后一个相关的惊喜是：此后所有的战车，都以公元前2世纪欧亚草原上发展出的模型为基础，并迅速传播开，东至中国，西至爱尔兰。这是早期全球化和技术快速扩散的一个绝佳例证，就如同如今的电动汽车。

戴维·查费茨：《史记》和《汉书》是研究中国早期历史的核心文献，这两部书中都有大量关于马匹的记载，既有直接提及，也有间接体现。例如，我们从《史记》中得知，秦国有强大的骑兵，这助力他们统一了中国——这是直接记载。但同样有趣的是，秦始皇的祖先曾是周朝的世袭马夫。由此可见，骑兵在战争中固然重要，而从事养马和驯马的家族，往往也能跻身最高阶层——这是关于马匹重要性的间接体现。我们还从这些文献中了解到，马匹在汉代兼具象征意义与实用价值。汉朝初期，马匹稀缺，皇帝甚至无法为其战车配备拥有同一种祥瑞毛色的马匹。马匹的实际短缺导致其仪式性或象征性用途被（暂时）搁置。基于这段记载，我认为我们可以推断出汉朝为何停止了对秦朝及更早朝代用真马殉葬的习俗。正是由于马匹的稀缺性，或是其日益增长的实用价值，人们开始用陶马替代真马陪葬。这同样从侧面反映了马匹在古代中国的重要性——它们太过珍贵，不应为了古代的仪式而被随意销毁。因此，仔细研读这些核心文献，能让我们深入洞察马匹在古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戴维·查费茨：传统观点认为汉朝开辟西域是为了出口丝绸，但我发现核心需求是获取马匹，以摆脱对匈奴的依赖。汉朝与匈奴长期交战，匈奴骑兵凭借优良马匹和精湛骑射技能，机动性极强，给汉朝军队造成了巨大压力。然而，中国本土的气候与地理条件，难以培育出足够强壮、耐力十足的军用马匹，而匈奴则凭借草原优势，垄断了这类优质马匹的供应。如果向匈奴购买马匹，无异于增强对手的军事实力，这是汉朝统治者不愿看到的。因此，汉武帝才下定决心，从匈奴以西更远的地方——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的大宛国，获取被称为“汗血马”（又称天马、大宛马）的优良马匹。这段历史因“李广利伐大宛”的著名事件而被铭记，也正是这段远征，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匹之路”。

随着购马渠道开通，大规模贸易应运而生。汉朝每年需购买数万匹马，如此庞大的采购量，意味着必须出口同等

价值的商品作为交换。当时的中国，能够大量生产且在西方市场受欢迎的商品正是丝绸——但并非那种供贵族享用的精织奢侈品，而是相对粗糙的生丝。根据史料记载，在唐代，40匹生丝就能换一匹优质战马。此时的生丝，其属性更像是一种“纸币”，而非单纯的消费品。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在丝绸之路的考古遗址中，会发现大量生丝被埋藏——古人将生丝当作财富储存，就像如今我们埋藏钱币一样。

丝绸之路服务于马匹需求，两者共同推动了欧亚交流：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重要的植物品种源源不断地向西传播；西方的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等宗教，以及音乐、舞蹈、艺术等文化元素，随着商人、使者传入中国。敦煌的白马塔正是为了纪念伟大的佛教传教士鸠摩罗什的坐骑白马——他东传佛法途经敦煌时，其坐骑白马病死；而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其坐骑在《西游记》中化身为白龙马，这一文学形象的背后，也正是这段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戴维·查费茨：传统马匹在诸多方面都独具特殊性。作为商品，它能自行运输。当马商从遥远的大宛或撒马尔罕前往中国时，他们会赶着马群前行，沿途放牧。在某种程度上，旅程耗时一年还是两年并不重要——只要能往返，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笔不错的生意。与此同时，马队队伍很容易转变为伺机而动的劫掠者，因为他们总是随身携带武器，且具备突袭和机动的优势。中国历代政府都坚持要求草原养马民族在边境特定的市场（即所谓的“马市”）进行交易，这一政策确保了外来者不会威胁公共安全。有时，养马民族会蓄意发动对中原地区的进攻。例如，当他们的马匹售价过低，或者马匹存栏过多（通常发生在牧草丰美的年份）导致价格下跌时，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而在战争状态下，中国对马匹的需求会增加，马匹价格也会上涨。因此，尽管看似奇怪，草原养马民族的确有动机对中原地区开战。

戴维·查费茨：共性十分明显：三国都与草原相邻，核心区域养马能力不足，需通过贸易获取马匹，因此管理马贸的人权力巨大，精通马术者构成精英阶层。例如，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统治者源自草原，马术与骑射是贵族的必备技能，负责马匹的官员往往能进入权力核心；俄国的贵族阶层也以马术精湛为荣，马术训练是贵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与定居文明的精英流动性强，共享礼仪与战斗伦理，如安禄山作为胡人将领，凭借精湛马术与军事才能成为唐代节度使；蒙古人在罗斯地区建立金帐汗国后，不少蒙古贵族融入当地上层社会。军事上，三国骑兵装备、训练都借鉴草原模式，骑兵是战场主力，良马是

重要奖赏，军衔高低往往与统领骑兵的数量相关。

戴维·查费茨：这种演变背后是人类对马匹特质的感知与需求的不断深化。或许在人类驯化马匹之前，它就已成为文化符号——洞穴壁画中最常见的哺乳动物就是马，在法国拉斯科洞窟、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等遗址中，都有大量精美的马形壁画，展现了早期人类对马的关注。马未被驯化时，人类墓葬中就已出现马骨，表明马在当时被视为与灵魂相关的特殊存在。

戴维·查费茨：核心启示是，合作需建立共同基础，互补才能实现共赢。草原民族拥有优质马匹，却缺乏粮食、丝绸等物资；中原王朝有丰富农产品与手工业品，却急需军用马匹。这种互补性是双方长期贸易的基础，双方都从合作中获益。这告诉我们，当代资源竞争中，与其陷入“零和博弈”，不如寻找互补性，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体系。在资源竞争中，构建互补合作体系，找到共同利益与文化共鸣，是马匹贸易留给当代的重要智慧。

戴维·查费茨：我们常以日期、朝代教授历史，但人们更想知道“为何”。我希望他们明白，人类并非孤独的世界主宰，文明是文明的、重要伙伴。马匹推动欧亚交流与贸易，牛、羊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狗陪伴人类狩猎与生活，动物在人类文明的节点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与这些动物一起改变了世界，如今仍在与它们共同塑造未来。

戴维·查费茨：西方马匹的两大角色在中国并不突出：一是农业用途，欧洲农民用马耕地、拉车，马匹是农业生产的核心劳动力，象征着和平与繁荣，类似中国的水牛。这种绑定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拖拉机普及后，马拉耕地才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不少欧洲老人仍对耕马充满怀旧之情。二是贵族身份标志，7—8世纪草原民族入侵欧洲，欧洲国王和贵族组建骑兵防御部队，逐渐形成骑士阶层。国王将土地分封给骑士，让他们自行承担马匹、盔甲的养护费用，一匹战马的饲养成本相当于一个村庄的年收入，稀缺性让骑士成为特权阶层。

戴维·查费茨：西方马匹的两大角色在中国并不突出：一是农业用途，欧洲农民用马耕地、拉车，马匹是农业生产的核心劳动力，象征着和平与繁荣，类似中国的水牛。这种绑定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拖拉机普及后